

跨文化对话视野中的《中亚文明史》*

施 越

摘 要:《中亚文明史》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完成的大型区域史编纂项目。本文尝试从该项目对“中亚”概念的界定、编纂项目的时代背景以及对当代中亚文明的塑造三方面探讨其历史意义。本文认为,尽管该项目在发起之初带有一定的公共外交目的,但在近半个世纪的编纂过程中,这一项目不仅推动了各国学界关于“中亚”概念内涵以及中亚古代文明研究的跨文化对话,而且在客观上为独立后的中亚五国提供了呈现自身当代文明的权威媒介,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塑造当代中亚文明。

关键词:《中亚文明史》 跨文化对话 中亚 历史编纂学

1979年10月15日,包尔汉、陈翰笙、梅益、季羨林、夏鼐、翁独健、韩儒林、梁寒冰、章巽、孙毓棠、熊德基、朱杰勤等著名专家学者齐聚天津,参加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的成立大会。由此,我国历史上首个以“中亚”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团体正式成立。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陈翰笙先生出任该协会的理事长,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研究室副主任马雍先生担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用著名元史学者陈高华先生的话来说,这一协会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中亚史研究和丝绸之路史研究。^①

这一机构的成立,是因为我国学界同年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亚洲文明研究专题”委托项目(批准号:21@WTA002)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① 党宝海:《丝绸之路漫谈——访陈高华先生》,《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2期,第92页。

(UNESCO) 发起的《中亚文明史》编纂项目。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明史”系列项目之一，这一项目发轫于1966年，最初由苏联与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共同发起，旨在“描绘丰富的文化多样性，为共同的未来奠定基础”^①。回归历史现场，这一工程最初包含苏联向世界展示其东方民族发展成就的目的，且与苏联推动面向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公共外交密切相关。但在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进程中，这一项目逐渐成为中亚各国学者与中国、法国、伊朗、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学者交流互动的平台。而在1991年之后中亚各国独立的新时代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编纂的《中亚文明史》更是成为外部世界认知新兴的中亚五国的重要窗口，在客观上帮助塑造了全球化时代的中亚文明。我国学界已有前人学者关注到这一国际化编纂项目对于构建中亚文明的意义^②，但较少探讨这一项目的编纂过程及其中的跨文化对话内涵。本文尝试从《中亚文明史》项目对“中亚”概念的界定、编纂项目的时代背景以及对当代中亚文明的塑造三方面入手，揭示这一项目的深远影响。

一、“词”与“物”之间的中亚

自启动之初，《中亚文明史》编纂项目首先要处理的是对“中亚”概念地理范围的界定。而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近代“中亚”概念的形成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对话的进程。对亚欧大陆古代历史感兴趣的读者往往会注意到，“中亚”一词至少存在着狭义和广义两种界定方式。狭义的“中亚”多用于国际政治语境，指代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构成的地理空间。

① [伊朗] C. 阿德尔、M. K. 帕拉特等编：《中亚文明史·第六卷（上）》，吴强、许勤华译，北京：中译出版社，2016年，第6页。

② 刘颖：《中亚史前文明的书写建构》，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陈霞：《评中文版〈中亚文明史〉第一、二卷》，《新疆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第89—92页。

而在历史、地理和文化领域，广义的“中亚”涵盖东起大兴安岭、西濒里海甚至黑海、北接西伯利亚、南至南亚次大陆北部的广袤空间。实际上，“中亚”一词自19世纪初出现于欧洲地理学界以来，其内涵在不同时期随着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多次变更。

以“中亚”一词来描述亚洲中部的广袤陆地空间源自近代欧洲的地理学传统。这一指涉关系的形成与两个层面的知识—权力活动密切相关：其一是18世纪以来欧洲地理学界对亚洲腹地的考察，其二是19世纪以降欧洲列强在地缘政治博弈背景下对地理术语及其内涵的争夺。在第一个层面，随着18世纪以降欧洲大地测量学和制图术的演进，亚洲腹地的地理及其居住人口的状况对于欧洲学界而言逐渐明晰。以帕拉斯（Peter Simon Pallas）、纳扎罗夫（F. M. Nazarov）、迈恩多夫（E. K. Meindorf）和谢苗诺夫（P. P. Semeonov）为代表的学者和军官通过科学考察逐步积累了关于这一地域的地形、山脉、水文、动植物和人类聚落信息。而以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为代表的博物学家根据上述考察信息构建对亚洲地理的综合描述以及对特定现象成因的推理。例如，洪堡将青藏高原、兴都库什山、西高止山、伊朗高原和高加索山脉称为“高地亚洲”（Haute Asie），而与之相对的是天山南部和西侧的低地。而他认定的“中亚”（Asie centrale）则是部分覆盖上述地理单元、由北纬44.5°向南北各延伸5°的区域。^①在一系列科学考察的推动下，欧洲学界逐渐摒弃了早期近代长期使用的“鞑靼利亚”一词，因其包含较为狭隘的族裔和宗教意涵^②，而代之以“高地亚洲”“中亚”“内亚”和“图兰”等术语。

在第二个层面，上述术语的具体内涵及其使用则不可避免地受

①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sie centrale. Recherches sur les chaînes de montagnes et la climatologie comparée*. Paris: Gide. 1843. T. 1, P. XXVIII. 1890—1907年间俄罗斯出版的《布罗克豪斯和叶夫龙百科全书》“中亚”（Средняя Азия）词条也部分参考了洪堡的定义，参见Брокгауз Ф. А. и Ефрон И. А.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Брокгауза и Ефрона*. Т. 21. СПб., 1900. С. 351。

② 黄达远：《从鞑靼利亚到亚洲俄罗斯与中亚：17—20世纪初的东方主义、地理考察与空间建构》，《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第115—121页。

到19世纪下半叶欧洲列强之间地缘政治竞争的影响。在拿破仑战争（1803—1815）之后，得益于相对有利的地缘条件，俄罗斯在探索和定义亚洲腹地的空间和人群方面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尽管以洪堡为代表的欧陆地理学界坚持以地理要素定义中亚的范围，且尤其强调这一概念包含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伊朗高原等亚洲腹地的“高地”，但俄国的军官、学者和作家则在潜移默化中将中亚的范围向西偏移，将其塑造为以俄国属地为中心的地理空间。这一现象与19世纪下半叶两种相互交织的进程密切相关。首先，19世纪60—90年代俄国征服了北起锡尔河、南至阿姆河流域的地理空间，并与英国瓜分帕米尔山以西的亚洲内陆地区。这一政治现实激发了同时期俄罗斯知识界兴盛的主体意识，使得俄国的政客、军官和知识分子对俄国在亚洲的“文明使命”寄予厚望。其次，19世纪下半叶欧洲出现的政治地理学成为俄国地理学家和知识分子重新认识本国版图的思想资源。以达尼列夫斯基（Nikolai Danilevsky）和拉曼斯基（Vladimir Ivanovich Lamansky）为代表的俄国知识分子将欧亚大陆视为由三部分组成的空间：罗马—日耳曼的欧洲，欧亚—俄罗斯所占据的“中部世界”以及非俄罗斯的亚洲。他们将俄罗斯塑造为有别于欧洲的独特文明，传承来自希腊和拜占庭正统宗教和救世精神。^①而在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并入俄国版图后，这一地区为论证俄罗斯的“文明使命”提供了新的素材。汉尼科夫（Nikolai Khanykov）和穆什凯托夫（Ivan Mushketov）等俄罗斯地理学家提出有别于洪堡和李希霍芬的“中亚”定义，将中亚的地理边界逐渐移动到俄国新征服地区，进而证明俄罗斯是有别于欧洲和亚洲的“中间世界”，昭示其未来在亚洲“传播文明”的使命。^②因此，至19世纪末，尽管欧洲学界主要从地理学角度将中亚定义为东至大兴安

① В. Ламанский Три мира азиатско-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материка. СПб., 1892; 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 Я. 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Взгляд на культурны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лавянского мира к Германо-Романскому. 5-е изд. СПб., 1895.

② С.М. Горшенева Изобретение концепта Средней/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ежду наукой и геополитикой. Вашингтон, 2019. С. 39-52.

岭、西至里海的内流河区域^①，但在俄国学界，中亚所指称的地理范围以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为中心。

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亚”一词随着苏联的本土化政策而大规模进入行政和经济领域。1923年，苏联当局在塔什干建立中亚大学（Среднеазиат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САГУ）。这是该地区成立的第一所现代高等教育机构，1960年更名为塔什干国立大学后，至今仍然是乌兹别克斯坦最重要的综合性大学之一。1924—1925年苏联推动民族划界和民族共和国组建后，苏联当局于1926年成立中亚军区（Среднеазиатский военный округ），覆盖从西伯利亚以南一直到阿富汗边境的空间。1928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苏联依照各地资源禀赋和基础设施条件将全境划分为经济区，与乌兹别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和塔吉克四个民族自治行政单元相对应的“中亚经济区”（Среднеазиат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айон）正是其中之一。尽管苏联着力推动“中亚”一词与其东南部加盟共和国的行政边界重合，但同一时期的欧美学界更倾向于沿用洪堡和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的地理学界定方式。

编纂于20世纪下半叶的《中亚文明史》项目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上述两种中亚定义达成和解的平台。从参与《中亚文明史》编纂的成员国构成情况来看，这一项目采用的是更接近于近代欧洲地理学者所提倡的中亚概念。197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苏联塔吉克共和国的首都杜尚别召开会议，明确了项目对应的地理空间位于“阿富汗、中国西部、印度北部、伊朗东北部、蒙古国、巴基斯坦和苏联的中亚诸共和国”领土范围内，但同时指出，编纂项目关切的对象是“这一地区各民族和诸文明的历史，因此地理边界并不会对历史书写产生严

^①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Bd. I, Berlin, 1877, p. 3.

格的约束”。^①尽管如此，实际上各卷内部章节基本遵循河中地区、草原地区、蒙古高原、塔里木盆地、东伊朗地区、南亚北部对应的地理空间排序，即俄苏地缘政治空间内部的狭义中亚在项目编纂中处于中心地位。

二、《中亚文明史》项目的编纂历程

《中亚文明史》的跨文化对话内涵不仅体现在对核心概念的处理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一项目始终推动着中亚域内学者与国际学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编纂项目始于196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4届大会上的一项决议，即批准开展关于中亚的研究计划。1967年4月，根据上述会议精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召开首次中亚文明研讨会，达成了关于“中亚”地理范围界定方式的初步共识。

为配合上述研究计划，1973年，时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长、苏联科学院院士加富罗夫（B. G. Gafurov）倡议成立国际中亚文化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Cultures of Central Asia, IASCCA），负责召集和协调各国学者对中亚历史和文化开展跨学科研究并提供咨询。1976年10—11月，教科文组织第十九届大会授权时任总干事开展编写《中亚文明史》计划，由阿富汗、中国、印度、伊朗、蒙古国、巴基斯坦和苏联合作开展。^②

经过长期酝酿，1980年8月，一个由19名专家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成立。委员会包括一名主席、四名副主席和一名报告员。其专家成员由七个成员国（阿富汗、印度、伊朗、蒙古国、巴基斯坦、苏联和中国）各派出2名代表，加上5名欧美和日本学界的知名学者。1980年12月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会议后，《中亚文明史》的编纂和筹备工

① A. H. 丹尼、V. M. 马松编：《中亚文明史·第一卷》，芮传明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第368页。

② 《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科学中国人》2003年第6期，第1页。

作从1981年开始。

表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国际科学委员会名单（1993年之前）^①

姓名	国籍	分工
M. S. Asimov	塔吉克斯坦	国际科学委员会主席、第四卷主编
A. H. Dani	巴基斯坦	第一卷主编
N. A. Baloch	巴基斯坦	
B. N. Puri	印度	
B. K. Thapar	印度	
R. Shabani Samghabadi	伊朗	第三卷副主编
M. Bastani Parizi	伊朗	
S. Bira	蒙古国	
S. Natsagdorj	蒙古国	
K. Enoki（榎一雄）	日本	
G. F. Etemadi	阿富汗	第二卷副主编
M. H. Z. Safi	阿富汗	
A. Sayili	土耳其	
J. Harmatta	匈牙利	第二卷主编
刘存宽	中国	
张广达	中国	第三卷副主编
L. I. Miroshnikov	俄罗斯	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人
F. R. Allchin	英国	
D. Sinor	美国	

在实际编纂过程中，国际科学委员会划定各卷的大致历史分期，由各卷主编和副主编组织学者分章节编写。以第一卷《文明的曙光：

^① A. H. 丹尼、V. M. 马松编：《中亚文明史·第一卷》，芮传明译，第12页。

远古时代至公元前700年》为例，主编丹尼（A. H. Dani）和马松（V. M. Masson）分别是巴基斯坦和苏联的知名考古学者。全书由来自11国的23位学者合作完成（参见表2）。其中部分章节还涉及多位不同国家学者的合作，如第二章“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由来自苏联塔吉克共和国历史学研究所的拉诺夫、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多尔基和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吕遵谔三位学者共同完成。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通讯条件尚不发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一项目无疑为各国相关领域学者提供了交流研究成果、开拓学术视野的国际性平台。

表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第一卷供稿人信息^①

姓名	国籍	第一卷编纂期间的供职机构
Bridget Allchin	英国	古代印度和伊朗信托基金
A. Askarov	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	乌兹别克共和国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
A. H. Dani	巴基斯坦	真纳大学中亚文明研究中心
A. P. Derevyanko	苏联	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历史、语文和哲学研究所
D. Dorj	蒙古国	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J. Harmatta	匈牙利	匈牙利科学院语言学和文学研究所
M. A. Joyenda	阿富汗	卡布尔大学国际贵霜研究中心、考古学研究所
B. B. Lal	印度	西姆拉高等研究所
B. A. Litvinsky	苏联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S. Malek Shahmirzadi	伊朗	德黑兰大学
V. M. Masson	苏联	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分院考古学研究所
L. I. Miroshnikov	苏联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L. T. P'yankova	苏联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① A. H. 丹尼、V. M. 马松编：《中亚文明史·第一卷》，芮传明译，第13—14页。

续表

姓名	国籍	第一卷编纂期间的供职机构
V. Ranov	苏联塔吉克共和国	历史学研究所考古学室
V. Sarianidi	苏联	苏联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
N. Ser-Odjav	蒙古国	蒙古国科学院历史学研究所
J. G. Shaffer	美国	美国凯斯西储大学考古学系
M. Sharif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卡拉奇市政府勘探发掘局考古处
B. K. Thaper	印度	文化资源和训练中心
M. Tosi	意大利	意大利中东和远东研究所
V. Volkov	苏联	苏联科学院历史学研究所
安志敏	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
吕遵涛	中国	北京大学历史系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近代以来关于中亚地区的知识生产机制，这一项目最重要的特点是中亚各国的学者成了跨文化对话主体。一方面，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中亚文明史》编纂过程的官方叙述来看，这一项目的发起和开展与苏联的中亚研究学界，尤其是部分塔吉克族学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项目初期最为重要的组织者是长期担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长长的加富罗夫（B. G. Gafurov）。加富罗夫自1936年起长期担任塔吉克共产党领导职务，1946—1956年担任塔共第一书记，其间于1948—1951年兼任塔国当时首都斯大林纳巴德（今杜尚市）的市党委第一书记。1956—1977年，他调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长，是卫国战争之后该机构任职时间最长的所长。在担任塔共第一书记期间，他主持编写了塔国首部通史《塔吉克人民历史》^①，是塔国民族文化知识体系的奠基人。在1981年编纂项目正式启

① 该书原名为 *История таджикского народа*，中文节译本题为《中亚塔吉克史》，参见〔苏〕加富罗夫《中亚塔吉克史》，肖之兴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动后，时任塔吉克共和国科学院主席阿西莫夫（M. S. Asimov）长期担任负责统筹推动该工程的国际科学委员会主席。阿西莫夫早在1962年便担任塔国教育部长，后当选塔共中央书记，担任塔共部长会议副主席。1965—1988年间，阿西莫夫长期担任塔国科学院主席，1974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是《塔吉克苏维埃大百科全书》的主编，也担任《中亚文明史》第四卷主编。此外，各卷均有来自苏联的中亚加盟共和国或独立后中亚五国的学者参与写作。尤其是在涉及16世纪之后的第五、六两卷中，中亚各国的学者成为本国国别史章节的书写者。

另一方面，在项目推动的过程中，苏联中亚各国的主要城市成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位于巴黎）同等地位的工作会议召集地。1976年第十九届大会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编委会组织、塔吉克共和国首府召开的“中亚古代民族史问题”学术会议期间举行咨询会议。此次会议再次肯定1967年首次中亚文明研讨会上对中亚地理边界界定的共识。1982年，《中亚文明史》编委会在杜尚别召开题为“中亚地区新石器时代消费与生产的经济类型”的学术会议。1985年9月，国际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组织于哈萨克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举办“中世纪中亚文化—历史发展过程”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到来自匈牙利、德国、印度、伊朗、蒙古、巴基斯坦、美国和土耳其的一百多名学者。^①可见，借助这一项目，中亚国家也逐渐走上国际学术舞台，成为各国学者聚首研讨的目的地。

上述现象与《中亚文明史》项目所处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项目发起的20世纪60年代是世界范围内反殖民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这一时期，中亚各共和国经过二战之后的重建，逐渐成为苏联面向亚非拉地区开展公共外交的窗口。自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中亚地区因俄国的征服而被卷入近代世界体系，随十月革命而经历了大规模的社会动

^①〔苏〕米罗什尼科夫：《〈中亚文明史〉与阿拉木图国际学术会议》，申屠榕译，《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6年第4期，第39—44页。

员和现代化改造。经过1924—1925年中亚地区民族划界以及1929年、1936年两轮调整后，苏联中亚五国的政治版图基本形成。与国家政权建立相辅相成的是各民族知识体系的构建。20世纪30年代开始，苏联科学院的历史学、考古学和东方学研究所开始搜集整理和出版苏联各族历史资料。例如，1934—1939年完成的“土库曼项目”旨在从中世纪伊斯兰文献中整理和翻译与土库曼族相关的史料，并筹备编纂通史。^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大批学者被疏散到塔什干和阿拉木图。在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支持下，来自学术中心的学术精英积极参与到培养地方学者和编纂加盟共和国的通史的工作中。1943年出版的《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从远古到当下》正是首部苏联中亚五国的国别通史。^②20世纪50年代，苏联中亚各国在苏联科学院分院的基础上相继建立了各共和国科学院和相应的人文研究部门。在二战后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苏联官方学术机构形成了对中亚各民族语言、文学、历史、考古和民俗等领域相对完备的知识再生产体系。

同一时期，苏联中亚五国在物质层面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扫盲运动、集体化、工业化以及二战后的垦荒运动之后，中亚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和民众受教育程度显著提升。20世纪50年代，苏联在中亚地区投资建设一系列水电、煤炭、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开采、钢铁冶炼和机械制造企业，并大规模升级交通和电网。例如，哈萨克共和国的卡拉干达冶金联合体于1954年投产，中亚第一座核反应堆于1959年在乌兹别克共和国投产。^③在农业领域，哈萨克共和国北部被开发为谷物生产基地，而南部四国则成为全苏联的棉花生

① A. K. Bustanov, *Soviet Orientalism and the Creation of Central Asian N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 5-8.

② Абдыкалыкова М. и Панкратовой А. ред.,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Алма-Ата, 1943.

③ 丁笃本：《中亚通史（现代卷）》，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6—278页。

产基地。这一时期中亚各国的文教领域同样蓬勃发展，涌现了以阿乌埃佐夫（Mukhtar Auezov）、艾特玛托夫（Chingiz Aitmatov）、卡哈尔（Abdulla Qahhor）和艾尼（Sadriiddin Ayni）为代表的作家，以卡斯捷耶夫（Abylkhan Kasteev）和坦瑟克巴耶夫（Ural Tansyqbayev）为代表的画家和艺术家等。根据1959年统计数据，乌兹别克共和国每千人中等教育文凭获得者数量为263人，每千人高等教育文凭获得者达到18人，两项数据均与全苏平均数据持平。^①

在1956年之后，为呼应全球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塔什干逐渐成为苏联向包括伊斯兰国家在内的亚非拉国家开展外交工作的窗口。1958年，由杜波依斯（W. E. Dubois）等名人参加的亚非作家协会在塔什干举行第一次会议。1960年2月，莫斯科主办第25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参会的各国学者顺道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1966年1月10日，印巴两国领导人在塔什干签订结束1965年战争的《塔什干宣言》。正是在上述背景下，苏联推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亚文明史》编纂工程，积极向世界展示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社会经济建设成就和学术研究成果。

苏联中亚研究学界内部关于如何书写中亚历史的分歧也反映在《中亚文明史》编纂工程中。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区域史（regional history）与国族史（national history）之间的关系问题。20世纪30年代苏联中亚五国的边界和行政机构确立后，40—60年代各加盟共和国的历史研究机构陆续设立，各国通史作品陆续出版。国族史对于为新生的加盟共和国提供合法性而言至关重要。但国族史路径本身也意味着以国境线为地理边界、以命名民族族源为主线拆解和重构欧亚大陆各地人群互动的漫长过程。

1974年，苏联科学院历史学研究所召集苏联中亚各国学者开会研讨苏联中亚区域通史写作的可能性。历史学研究所时任所长纳罗奇尼

^① Eren Tasar, *Soviet and Muslim: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slam in Central 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27.

茨基 (A. L. Narochnitskii) 在会议报告中提议由历史学研究所指导和协调东方学研究所、考古学研究所等机构共同开展“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区域史 (从远古到当下)”的历史编纂工程。纳氏认为, 此前各加盟共和国通史著作的出版标志着各国国别历史编纂已经成熟, 而区域史则有利于阐述不同地区人民之间的历史联系, 照应同时期亚非拉各地区的反殖民运动, 宣扬国际主义精神。此外, 区域史有助于修正国族史对特定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方式, 减缓各加盟共和国对特定历史人物国族归属权的竞争。最后, 区域史研究项目将有助于推动全苏范围内中央和地方历史学家之间以及各人文学科之间学者的交流。同一时期, 北高加索、南高加索和波罗的海各地的地方科研机构也在尝试探索类似的区域史研究项目。^①区域史与国族史并非完全对立, 两者可相互补充。但由于两种历史书写路径各有其原则, 历史学者在编纂过程中难免感受到二者间的张力。

上述两种路径之间的竞争关系同样存在于《中亚文明史》的编纂过程中。完成于20世纪80—90年代中期的前四卷 (远古至15世纪末) 基本坚持了区域史的路径, 主要以考古文化类型、大型跨地域政权和宗教文化圈为叙述框架, 辅之以自然地理、生产方式、语言文学和艺术文化等专题章节。受国别分工因素的局限, 各章的章节顺序一定程度上仍按照主题对应的国别地域排布。但整体而言, 15世纪末以前中亚地区的游牧与农耕两类生产方式长期交融、周边各文明与该地区长期互动的格局得到了充分的阐释。《中亚文明史》的第五、六卷处理15世纪末至20世纪末的各个历史时期。国族史路径在这两卷的编纂中逐渐显现。具体而言, 这两卷的章节设计有着更鲜明的国族中心色彩: 第五卷前五章逐一叙述苏联中亚五国的命名民族在16—19世纪中叶期间的经历, 且由各对象国学者撰写。第六卷尽管尝试以英俄两国19世纪的扩张和统治开篇, 但第二部分“政治变迁与国家的建立”仍不可

^① A. K. Bustanov, *Soviet Orientalism and the Creation of Central Asian N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 70–71.

避免地以1991年之后区域内各国为单元，逐一叙述其自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末的历程。第五、六卷采用国族史路径固然存在其学理层面的合理性，而1991年之后整个区域地缘政治格局的剧变不可避免地推动了国族史路径的回归。尽管编纂过程包含了上述内在张力，相较于19世纪初以降的欧洲学术传统，这一项目不再是域外知识生产中心关于中亚的对话，而是切实地推动了中亚各地本土学者与世界的对话。

三、《中亚文明史》对当代中亚文明的塑造

1991年12月，在苏联大厦将倾之际，中亚五国相继通过主权宣言，宣告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对于中亚地区而言，新的政治现实一方面将重新定义“中亚”一词的内涵，另一方面则将激发各国以主体民族为本深化国族构建。1993年1月3日，在独立之初政治经济转型的艰难时刻，中亚五国领导人在塔什干举行峰会，会议名称使用了俄文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一词指称“中亚”。^①同年9月，哈乌吉三国签署协议，仿照欧盟模式筹备建立“中亚联盟”（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ий союз）。尽管中亚联盟至今尚未取得实质进展，但此后俄文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与英文Central Asia形成稳定的对应关系，均指称中亚五国。与此相应，中文学术概念“中亚”也逐步与上述二者的内涵对接，指代中亚五国所在的地理空间。

与构建新的共同区域身份同步展开的是国族认同层面的去苏联化和在地化。这一时期，中亚五国在20世纪中期构建的国族语文和历史基础上大规模更新国语、城市名称、街道名称和公共纪念建筑等领域的政治符号。^②各国主体民族的古代历史被进一步浪漫化。口传文学和文献

① 李琪：《“中亚”所指及其历史演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62—76页；ОБС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спасения Арала. Ташкент, 2011。

② 杨成：《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5期，第93—159页。

记载的古代人物被塑造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民族先祖。中世纪各地方性政权被视为各现代国家的前身，进而成为声称当下领土合法性的论据。

与对象地区的处境相似，《中亚文明史》编纂工程在20世纪90年代同样面临多重挑战。首先，苏联的解体导致原先推动和统筹整个编纂工程的主要力量不复存在，俄罗斯联邦和中亚五国在这一时期均陷入不同程度的经济困境。各国的人文学者面临极大的生存压力，部分知识精英选择移民欧美国家。更为不幸的是，《中亚文明史》编纂工程国际科学委员会的首任主席阿西莫夫于1996年在杜尚别身亡。项目一度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

表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国际科学委员会名单（1993年之后）^①

姓名	国籍	分工
C. Adle	法国	第五卷及第六卷主编
K. M. Baipakov	哈萨克斯坦	第五卷副主编
D. A. Alimova	乌兹别克斯坦	
M. Annanepesov	土库曼斯坦	
A. Tabyshalieva	吉尔吉斯斯坦	第六卷副主编
M. Dinorshoev	塔吉克斯坦	
A. H. Dani	巴基斯坦	第一卷主编
S. Bira	蒙古国	
Irfan Habib	印度/法国	第五卷主编
R. Farhadi	阿富汗	
I. Togan	土耳其	
吴云贵	中国	
L. I. Miroshnikov	俄罗斯	委员会报告人
H. P. Francfort	法国	
D. Sinor	美国	
H. Umemura（梅村坦）	日本	

① [法] C. 阿德尔、M. K. 帕拉特等编：《中亚文明史·第六卷（上）》，吴强、许勤华译，第16页。

在这一困难关头，总部位于法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转而寻求法国的东方学和考古学界为这一项目提供支持。法籍伊朗裔学者阿德尔（Chahryar Adle）临时接替阿西莫夫，统筹《中亚文明史》的后续编纂工作，并担任尚未完成的第五、六卷的主编。这两卷由来自21个国家的94名学者合作完成，其中法国学者人数高达11人（参见表4），远超其他各国参与项目的平均学者数量。与此相应，1995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设立国际中亚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entral Asian Studies, IICAS），发行学术刊物《国际中亚研究所通讯》（Bulletin of IICAS），继续为《中亚文明史》提供学术联络支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协调下，这一批法国学者的专业范围涵盖中亚近代史、伊朗学、蒙古学、宗教学、艺术史等领域，为最后两卷的编纂提供了有力的智识支撑，也使得项目在客观上形成俄苏与欧陆学术传统对话的格局。

表4 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第五、六卷编纂的法国学者列表^①

姓名	第五、六卷编纂期间的供职机构	分工
C. Adle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第五卷及第六卷主编、第六卷第二十七章第一节
E. Alexandre	法国—蒙古国文化协会	第五卷第十八章第四部分
A. Okada	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	第五卷第十九章第二部分
Th. Zarcone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第二十五章第一部分
J. Calmard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第二十五章第六部分
M. Azzout		第二十九章
V. Fourmiau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第六卷第一章

① [伊朗] C. 阿德尔、M. K. 帕拉特等编：《中亚文明史·第五卷》，蓝琪译，北京：中译出版社，2016年，第21—24页；[伊朗] C. 阿德尔、M. K. 帕拉特等编：《中亚文明史·第六卷》，吴强、许勤华译，北京：中译出版社，2016年，第17—20页。

续表

姓名	第五、六卷编纂期间的供职机构	分工
A. Kian-Thiébaud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伊朗世界研究中心	第二十二章第二节
N. Nasiri-Moghaddam		第二十章
C. Poujol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亚历史与文化研究所	第六卷第一章
H. P. Francfort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不详

正如阿德尔所称，“在编写方面最困难和最棘手的，是涉及当代极为复杂的地缘政治状况的第六卷。”^①《中亚文明史》第六卷（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末）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中亚地区内外形势的剧变。首先，在勾勒时代主题的第一部分“延续与变化”安排了专章“知识分子与政治觉醒”，概览19世纪俄国统治下兴起的革新主义者及其历史地位。除土库曼斯坦以外，独立后的中亚各国均视近代革新主义者为当下政体和意识形态的先驱。其次，第六卷第二部分各国的专题章节由对象国历史学领域的专家执笔，基本反映独立后中亚五国的官方史观。再次，第三部分“环境、社会与文化”尽管尝试从主题切入探讨整个时代的区域性问题的，但在写作实践中，各章不可避免地在主题之下按照国家划分小节或段落。例如，在“中亚北部地区的艺术”一章，作者不得不在“压花铜雕”“珠宝饰品”“毛毡制品”等分节下逐一描述各国主体民族的艺术偏好。此种区域史嵌套国族史的处理方式固然会导致内容重复、议题割裂、信息琐碎和强化刻板印象、忽略个体差异和历时性变迁等问题，且可能遮蔽了中亚五国主体民族之外各族的重要文化艺术遗产。但在这一时期中亚国家强化国族建构的背景下，第六卷照应了1992年《中亚文明史》第一卷时任总干事马约尔（Federico Mayor）在序言开篇中提到的目标：“发展及增进各国

① [伊朗] C. 阿德尔、M. K. 帕拉特等编：《中亚文明史·第六卷（上）》，吴强、许勤华译，第3页。

人民之间的交往手段，并借此种手段之运用促成相互了解，达到对彼此之生活有一更真实、更全面认识之目的”。^①对于新生的中亚国家而言，《中亚文明史》第六卷成为向各国读者展示各自的现代文明的重要平台。

《中亚文明史》的英文版一经出版，我国学界便开始研究汉译工作。2000—2016年间，原书六卷的汉译本陆续付梓，成为汉语学界最为重要的中亚史参考著作之一。这一项目的汉译工作正由有本文开头提及的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组织推动。正如陈高华先生所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亚文明史》的编纂和汉译为契机，中国从事蒙元史、中外交流史、印度学、伊朗学、西域语文和史地研究、西域考古及艺术史等领域的学者积极开展与国际学界的学术交流，且在此过程中孕育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亚史研究队伍。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亚文明史》项目及其汉译工作更是成为中国与中亚各国交流的平台。1988—1997年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丝绸之路—交流之路综合研究”项目，1991年春夏邀请30多个国家的学者及国际知名文化机构人士遍历中亚五国的古代文明遗迹，1992年夏组织蒙古国境内各主要考古遗址的考察。^②

表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中文版各卷译者列表

卷序及标题	译者	审定
第一卷 文明的曙光：远古时代至公元前700年	芮传明	余太山
第二卷 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发展：公元前700年至公元250年	徐文堪、芮传明	余太山
第三卷 文明的交会：公元250年至750年	马小鹤	余太山

① [巴基斯坦] A. H. 丹尼、〔俄〕V. M. 马松编：《中亚文明史·第一卷》，芮传明译，第5页。

② 刘迎胜：《丝绸之路》，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8页。

续表

卷序及标题	译者	审定
第四卷（上） 辉煌时代：公元750年至15世纪末—— 历史、社会和经济背景	华涛	
第四卷（下） 辉煌时代：公元750年至15世纪末—— 文明的成就	刘迎胜	
第五卷（上） 对照鲜明的发展：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	蓝琪	余太山
第五卷（下） 对照鲜明的发展：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	蓝琪	余太山
第六卷（上） 走向现代文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末	吴强、许勤华	
第六卷（下） 走向现代文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末	吴强、许勤华	

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亚文明史》以及相关交流项目，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学界和大众逐渐熟悉古代中亚文明以及独立后中亚五国所主动塑造的现代文明。在这一长时段的多边跨文化对话过程中，《中亚文明史》一定程度上成为中亚各国展示自我以及世界各国认知中亚的权威媒介。换言之，历时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中亚文明史》编纂项目一定程度上参与塑造了当代的中亚文明。

结 语

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看，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项目最初由苏联发起，带有一定的公共外交色彩，但在近半个世纪的编纂过程中，这一项目一方面客观上为世界各国学界提供了一个围绕中亚古代文明和丝绸之路精神开展学术交流和跨文化对话的平台，另

一方面则为当代中亚五国提供了呈现自身历史叙事、向世界各国展示自身国族身份的权威媒介。正如其英文标题“中亚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所揭示的,“文明”(Civilizations)一词以复数形式出现。复数的“文明”在这里既可以被理解为指称古往今来中亚地区的各种政治实体,这些实体是古代文明的传播和繁荣的基础;也可以指代当代中亚五国的发展和对自身历史的叙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亚五国不得不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历史遗产和地缘形势谋求国族的存续和发展,在与世界各国的不断对话中创造同属于“中亚”但由各自定义的“文明”。